

中国古代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混合和开新

谢扬举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中国古代有发达的贤能政治思想及选举制度。西风东渐,中华文化传统里里外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恐怕首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受文化决定论和还原论影响,人们将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片面对立起来。孙中山先生秉持理性公允的文化态度,力持中国政治文明在世界上具有优势,值得珍惜、继承和发扬。长期以来,孙先生的观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冷静、系统的研究,致使我们在政治和文化心态方面极不自信。中国古代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对中国贤能政治及其选举制度和西方民主政治及其选举制度展开解剖、比较和融合,有望促使二者完善,有望产生更有优势的混合政治,有望解决文明冲突。

关键词:贤能政治;民主政治;文明冲突;混合政治

中图分类号:D0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2-0095-05

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和中国五大原创文明,其中只有中华文明不绝如缕而一脉承续至今。这其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因素发挥的作用,可是其辉煌的制度文明也是重要保障。但是,近代西方政治文明传入中国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制度传统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可以说遭遇了灭顶之灾。20世纪以来,西方民主政治及其制度一方面风行全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其固有的局限,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制度文化的精华由于时代的际遇一直处于世界主流政治趋势的边缘。随着历史的推进,我们应该超越政治文化自卑心态,沿着理性的道路,全面反思中西政治文明的得失,寻求中西政治文明融合创新的出路。

一、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近代位序和关系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接踵

而生,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建立在其上的文明体系。这一文明形态的跃迁,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西方政治思想和价值观也实现了革命性转变,古希腊和古罗马优秀的政治遗产在适应新时代中放射出现代的光芒,理性、求真、法治、公正、诚信、进步、自由、平等、博爱等成为普遍而基本的价值信念。借助这些新价值的指引,西方逐步实现了政治制度民主化,最终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消弭了人人怨愤的人类不平等的千年难题,扩大了公民自由和其他权利,解放了人的能力,使社会释放出极大的创造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对西方现代文明,中国有一个曲折的认识和批判的接受过程。明清以降,尤其是晚清以来,西风东渐,西方科学技术、价值理念和制度纷至沓来,引起了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国人先是羡慕西方的枪炮舰船乃至一切科学技术成果,后来感到西方之所以强盛在于制度优长,最后认识到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是西方历史变革与社会进步的深层动力。这些新思

收稿日期:2013-04-07

作者简介:谢扬举(1965-),男,安徽无为,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想也成了粉碎中国封建专制束缚的直接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在里里外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恐怕首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包括政治思想、价值观和制度。在西方民主政治冲击波面前,许多精英分子一时望风披靡,鲜有能够自始至终秉持理性公允的文化态度者。孙中山先生是屈指可数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力持中国政治文明在世界上具有优势,甚至有高过西方之处,值得珍惜、继承和发扬。他尤其赞赏早期儒家的治国之道,认为儒家提出了高明的政治哲学。然而,长期以来,受文化决定论与文化激进主义影响,孙先生的观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冷静系统的研究,致使我们在政治和文化心态方面极不自信。

孙先生的观点兼有很强的反驳性价值。我们可以提出下面的设问:为什么在两千多年严峻的专制桎梏中,中华文明仍然能绵延不绝并且创造出那么多辉煌成就?显然,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和制度设计有其合理与积极成分,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抵消专制积弊的作用。这主要是贤能政治思想和制度的作用。侯外庐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是贤人而不是智者主导的文化。从正面理解,这反映了儒家主导的中国政治文化存在着合乎现实理性的力量。

不能取消历史,不能否认近百年来西方民主思想及其选举制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现代化产生的革新作用。例如,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使得中国社会结构和形态发生天翻地覆的骤变,宪政、共和、民主的思想最终在总体上胜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对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和制度文明也产生了矫枉过正的消极作用。有一种笼统而草率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包括思想和制度)与中国封建专制躯干是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持类似极端立场的人们认为,如果我们要彻底挖掉帝制的命根,就意味着终究要革中国政治传统的命。更偏激者根据文化决定论和还原论的逻辑,进而主张要革掉整个中国文化的命!要全盘西化。似乎中国文化败坏到根部了,已经无可救药。

我们知道,文化与政治是不同范畴,中国传统文化毕竟不可等同于专制帝制,古代知识分子阶层毕竟有异于专制统治者。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制度包含很多立足天下、以民为本、合乎人性、尊重人格、长治久安等愿景和思考,古代存在许多在封建社会内

部反抗封建因素的思想精华,例如儒家提倡的选贤任能、顺天应人、大同小康原理,道家鲜明地捍卫根本道治、反对政治和思想专制,墨家倡导天下公利和道义……历代思想家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中国政治哲学的优秀成分,还有大量所谓异端思想家,更是表达了对现实专制政治的无情鞭策和深刻反思。

今日我们要真正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必须寻求突破口。笔者认为,首先就应该从矫枉过正的偏执入手,正确看待中国政治文明的优秀遗产,对中国政治思想和制度文明展开深入而具体的分析,从中国政治哲学和制度设计的精华自觉、自信起来。所谓精华,笔者指的是中国古代贤能政治思想和选举制度中的进步成分。历史已经走到这一步,近代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最大冲击就是民主政治,而这也正是我们拾起文化自信的挑战性焦点。不参透中国政治文化的积极价值并将其与民主政治的精华结合起来,使其在现实中得到运用,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跨越文化思维上自卑自责的峡谷,也就不可能达到更广义上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由此出发,笔者认为,近百年来中国曲折历史造成的复杂的中国文化心态需要进一步加以审视,直至得到彻底的重新调适。可喜的是我们的文化心态出现了完全康复的征兆,我们现在终于走上了文化自信的道路。这条道路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勇敢地正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开始平等而开放地看待中西文化乃至世界文明。这是健康的文化心态,也是文化思维本身的巨大进步。我们无法取消自己的民族性和历史性,不可陶醉于文化河伯主义,也无法通过无止境的自我否定和退缩让世界平等地对待我们,我们需要证明和展示自己的文化实力,给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自身需要自觉地走出排斥性的、非包容的文化立场。根据文化生态学的定律,混血的文化更有生命力,苟安于一隅的“纯种”文化势必衰微。在文化研究中,我们必须超越中西文化之争的窠臼,搁置狭隘的偏见,打破分离和对立的格局,建设性地重组世界文明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治文化这一环节不可绕过。中国贤能政治哲学及其选举制度含有不少精华,西方民主政治及其制度的合理因素也同属于人类,二者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完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使命。

二、中国贤能政治回顾

就目前而言,我们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强研究,力

争有所建树。中国古代贤能政治思想和选举制度源远流长、相得益彰,值得我们不带偏见地重新整理和发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大同时代重视“选贤与能”,小康时代着重“刑仁讲让”。中国人的大同和小康相结合的根本政治哲学原理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也不会过时。

选贤任能的理念在中国历史上起源很早,据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因为贤能突出而被推选出来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赖以确立并逐渐巩固和完善还有更深的原因,即不断得到理论的解释和论证。这些解释和论证的核心是贤能政治观念。贤能政治核心是贤贤使能,它是和“亲亲”、“尊尊”、“贵贵”相对而言的,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迸发为尚贤、贤贤的政治思潮,实际上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特别顽固的血缘宗法力量及世袭制度不断超越的趋势。春秋时期王道衰微,霸道兴起。延至战国,兼并之势日炽。竞争的时代催生出相对开放的人才选拔和任用机制,当时天下竞争以人才最为剧烈,所以各国诸侯大多求贤若渴。

先秦诸子百家大多极力倡言贤能政治。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中庸》)身处春秋末期的墨子堪称贤能政治理论最著名的提倡者,他始于学儒而后超越儒门,相信古代圣王统治是列德尚贤,转而鼓吹兼爱,要求依照公义推举贤能。他提出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则举,无能则下,一切悉凭公义进行。他认为统治者的中心任务就是扩展贤能人才,所以说:“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墨子·尚贤

上》)孟子坚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孟子·尽心下》),“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博引诸子而援儒学理想,同时以自己对战 国时代大势的把握改造儒学,隆礼又重法,《荀子·王制》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缪。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的思想体现出一个端倪,即贤能政治开始步出亲亲宗法的羁绊。《吕氏春秋》特别重视总结人才战略,书中称:“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者也七十一圣,观於《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特定时期列国竞争产生的人才选拔和任用思想、制度,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历史上贵族世袭制和贤能官僚政治展开拉锯战的开端。春秋战国之所以标志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高峰,与人才解放和勃兴也是相辅相成的。自此以后,贤能政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并产生了稳定、积极的作用。

与贤能思想相应,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制度文明,严密的选举制度堪称世界制度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有关这些选举制度的文献保存比较丰富,正史一般设有官制或职官史,例如“选举志”;还有《周礼》、《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等,对选举的起源、变迁、特点都有相应的记录、总结。中国古代选举形式多种多样,诸如荐举、科举、铨选、辟署、吏道、武选、门荫、学校等等,它们始终离不开贤能政治理念的导向,贤能政治理念是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理想的灵魂。回顾历史,古代选举制度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春秋以前,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战国到秦汉,国家管理系统逐渐分立,世袭制度不再是唯一根本合法的基础,但是贵族宗法维系的特点相当明显,举荐办法完全是统治者用人的工具;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地缘性门阀士族崛起,出现九品中正制度,科举萌芽;隋唐以后,三省六部制度确立,科举制逐渐成熟,官僚体制基本上摆脱了贵族化选官制度维系;两宋时期科举原则进一步强化,身世不再是人才选拔任用的主导标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更加严格规范,科举制度也出现更多弊端,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客观而论,就专制框架的

大背景而言,古代选举制可能最大限度地支撑和延续了封建官僚统治的模式及其权威性、有效性。

贤能政治思想和选举制度相得益彰,二者对中华文明的长期绵延及典型特质曾经发生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很快就传入周边国家,近代以后对西方文官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混合兼用的可能途径

比较中西政治文化,探讨贤能选举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互补性,吸收、改造民主政治而实现其中国化,是今日中国学者的重要课题。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能说贤能政治百无一是,完全过时;不能说贤能政治产自中国,唯有它最适合中国;也不能说西方民主政治一好百好,是绝对好、一切好的政治。事实上中国古代贤能政治思想及其选举制度有其弊病;民主政治及其选举制度既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糟。它们各有千秋,各有利弊,不存在对立和不相容的关系,我们对二者都要具体分析。贤能政治及其选举制在近代衰落了,这使得我们容易看到其缺点,而我们对民主政治往往缺乏批判性审视,很长时间内人们对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趋之若鹜、爱屋及乌,有时候完全丧失了基本的科学态度,丢掉了应有的严谨分析和独立批判精神。

应该说,中国古代选举制度有许多优点,比如对政治人的素质的要求,某些朝代就官员德能量表制定有极为详细的指标,罗列所及,可以说差不多穷尽了对政治人和政治各方面的要求,从外貌仪表、心理素质、操守人格、办事能力、言语态度、学识修养、经验资历到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魅力等等,令人称绝。古代选举政治所发明的考试、荐举、选拔、训练、任免、使用、回避、考绩、考德、程序化、制度化等方面多有可取的地方,这一点曾经深受孙中山先生赞扬。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贤能政治可以补充民主政治的不足。当然,古代中国贤能政治和选举制度的处境是专制的外部环境,选举权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受专制政体的决定性影响,贤能选举制度难逃工具性、依附性的地位,没有发挥出原本应有的作用,其结局难免演变成僵化、庞大的官僚体系。在古代官僚体制内部,人们感受不到个人良知运用和民主的余地,没有言议和行为的选择权利。贤能政治过去一直是在人治的夹缝中求生存,人治的统治强调义务而不是权利,人治政治总是杜绝不了破格、特例、

特权。贤能选举制度自身也存在问题,它没有找到贤能阶层的竞争规则和出路,只能借助所谓“让道”的提倡缓和矛盾,这种谦让之道使得贤能政治陷入泛道德主义泥淖,往往导致了逆淘汰的严重后果。从肯定因素看,贤能政治在现代的生存、运用和发展有多种可能途径,它可以化入多种政体,对不同的政治制度发挥完善作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都可以存用贤能政治。不过,我们的立场是:贤能政治不能取代民主选举而成为现代政治选举的基本形式,贤能政治整体上需要民主化才能保留并发挥更好的作用。

现代民主选举坚持主权在民,是人民共同选举为自己服务的代理人。民主政治及其选举制度也有漏洞。从古希腊的柏拉图直到当代,民主政治模式不断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批评,时至今日仍然面临着许多责难。民主是善政的手段还是目的?对这一问题没有恰当的认识,民主反而有可能妨碍善政的追求;大多数选民能保持参与的热情是民主政治实施的起码要求,但是怎么才能够保证这一点?即使选民自觉参与,然而他们能达到一致性或重叠共识吗?达到共识会不会以牺牲多样性为代价?民主制度理应代表人民的利益,可是它往往只是多数人的集团之间互相冲突的平衡;民主制难以避免多数人暴政,有时候少数人代表着真理因而必须得到保护,可是在现实社会中确保少数人的权利十分艰难;民主制在历史上曾经屡次排斥理智精英和道德圣徒,不免令人扼腕;民主制有时候会选出不民主、不贤能、蛊惑人心的政客或野心家;即便可以选举出优秀领导人,在民众和舆论过度干扰的体制内,他们往往难以发挥杰出作用;民主议事规则有时候会遇到过分的形式限制,势必损害效率;民主政治预设议员和领袖必定有高度责任感,但是这一点可靠与否不得而知;票决往往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出现意想不到的偏差,如何真正做到选举过程的准确性?民主竞选有时候会受到财经、强力等黑手因素的扰乱,因而失去公正性;民主政治有时流于粗鄙,使我们产生道德悲观情绪,等等。民主有许多问题,所以我们不断看到民主政治失灵和衰落的悲剧。邱吉尔说得好,民主政治只不过是坏不坏的制度。我们不能忘记,一味梦想民主制度能起到包医百病的作用是不可能的,而要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进化。从现代社会实情出发,使中国古代政治价值和选举制度与笼罩它的专制框架剥离,将其放到民主政治的大体中,使贤能政治重新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公开竞争

的基础之上,使其运作遵循法治化轨道、接受舆论公开监督。如此,才可以相信它有可能发挥巨大的积极价值,弥补民主政治的漏洞和缺陷。

四、结 语

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蔓延,中西文明之争在更广、更深、更高的层次上被重新提出来,不过不管争论的范围和层次如何,政治文化的根源性特质总是焦点之一;也就是说,中西文明之争必定渗透着政治理念、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传统的交锋。我们想逃避也逃避不了。福山声称自由民主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历史终结了,凸显了政治文化在文化体系中的重大作用。亨廷顿将文明之争视为决胜未来的终结战场,预示着政治和文明的内在关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回答中国社会与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就必然会遇到文化、政治相互嵌入的问题。也就是说,讨论文明关系,政治关系必定是连带性、潜在的中心性环节。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其目的不限于为了延续自家传统。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政治文明之争仍然关乎世界各国文化繁荣共存、中国民族文化命脉及综合软实力的战略思考问题。解决中西政治文明之争,是寻求文明和解和合作的必经环节。

对中国贤能政治及其选举制度和西方民主政治及其选举制度展开解剖、比较和融合,有望对中西政治文化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分析、会通、完善,从而进一步解决文明冲突难题。如果获得成功,必将有利于终结被过度宣扬的政治和传统文化的对立与纷争,造福中西方乃至全人类。

参考文献:

[1] 白 钢.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1.

[2]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3] 房列曙. 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4] 陈文新, 赵伯陶. 七史选举志校注[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5] 何怀宏. 世袭社会: 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6] 何怀宏. 选举社会: 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7] 赵汀阳. 天下体系[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8] 刘海峰. 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9] 杨学为. 中国考试通史[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0] 施路赫特. 理性化与官僚化: 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M]. 顾忠华, 译. 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4.

[11]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张立平,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12] 帕特里克·邓利维, 布伦登. 国家理论: 自由民主的政治学[M]. 欧阳景根, 尹冬华, 孙云竹,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3] 查尔斯·蒂利. 民主[M]. 魏洪钟,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

[14] 乔万尼·萨托利. 民主新论[M]. 冯克利,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

[15] 菲利普·内莫. 民主与城邦的衰落[M]. 张 竝,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6] 罗伯特·达尔. 民主及其批评者[M]. 曹海军, 佟德志,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17] 罗伯特·达尔. 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M]. 周军华,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18]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 黄胜强, 许铭原,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Merging and innovation of ancient sages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XIE Yang-ju

(Institute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as sages politics and developed system for sages selection. With the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have been facing a great challenge, especially

(下转第 104 页)

播才能顺利进行。而公众基本的科学素养都是 HPS 教育的主要内容,公众在通过接受科学知识、理解科学本质、培养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等几个方面的立体教育之后,基本上可以获得正确理解科学的综合素养。所以,HPS 教育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或者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参考文献:

- [1] AAAS. Project 2061-Science for all Americans [M]. Washington D C: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 [2] Royal Society.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R]. London:Royal Society,1985.
- [3] 殷登祥. 时代的呼唤: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 [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 [4] 彭 庆,冯 雪. 科学决策:公众参与少不得 [N]. 科技日报,2008-03-26(8).
- [5] 蔡铁权,姜旭英. 科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 [6] 吴俊明,骆红山,马勇平,等. 科学教育基础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7] 袁维新. HPS 教育与大学教育改革 [J]. 现代大学教育,2010,26(1):87-93.
- [8] 张 晶. 从科学知识观的社会学转向看国际科学教育改革的两大范式 [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32(6):160-163.
- [9]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 framework for K-12 science education: practices, crosscutting concepts, and core ideas [M]. Washington D 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11.
- [10] 马明辉. 美国科学教育发展的新阶段:作为实践的科学 [J]. 外国教育研究,2012,39(7):35-42.

HPS education and basic approaches fo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ZHANG J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Scientists are concerned with science but the public can als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science when they are outstanding and able to participate in scienc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can promote the spread of science. HPS education is a new method i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education reform, which can promot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here are five functions of HPS education, such as teaching science knowledge, pondering science nature, promo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cultivating scientific spirit and promot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HPS education;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sociology of science

(上接第 99 页)

in political cultur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determinism and reductionism, there was a tendency to set sages politics against democratic politics. Dr. SUN Zhong-shan, who held rational and unbiased cultural attitude, claimed that China's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as of advantage in the world and deserved to be cherished,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For a long time, Mr. SUN's point of view was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let alone sober and systematic study. We were also not highly confident in our politics and culture. For sage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y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o analyze, compare and merge these two kinds of politics may lead to a better combination so as to produce a merged politics to help solv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sage politics; democratic politics; civilization clash; merged politics